

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发展探析*

李秉忠

内容提要 土以关系 60 多年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阿拉伯和美国因素对双边关系影响明显、双边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和非常态性、正发党重塑了土以关系、双方认同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是土以关系的主要特征并影响着土以关系的未来。鉴于叙利亚局势的持续恶化已经外溢至土耳其和以色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已经做出新的姿态，土以关系从短期来看恢复和改善的基本条件正在齐备。从长远来看，由于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土以国内民意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权重日渐增加，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并未发生根本改观，土以关系未来发展难以一帆风顺。

关键词 土以关系 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

作者简介 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西安 710062）。

2010 年 5 月 31 日，加沙国际救援船队遭以色列袭击，由此引发的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降至二秘级已过去两年多，双边关系依然未有根本性改观。由于土耳其和以色列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特殊，发展道路各具特色却又都认同西方文明，由此二者外交关系的变动一直非常惹目。当下叙利亚局势的持续动荡和恶化，增加了土以关系的变数和学界的关注度。国内学术界较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10CMZ018）阶段性成果。

多地关注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①，但土以关系、尤其是土以关系的特点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综述学术界关于土以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的问题，以及土以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研究土以关系的特征和未来走向。

学术界对土以关系的研究概述

土耳其属于穆斯林-突厥文化，而以色列属于犹太文化，双边关系曾因此被称为不同文化相处的典范，有助于破解“文明冲突”的魔咒，更因双方的友好极大地服务于西方在中东的利益而为西方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学界经常用“奇特组合”、“舞台效应”、“以色列的情妇怨艾”这3组词来描述土以关系的特殊性，厄梅尔·塔什珀纳尔指出，土以关系往往具有一定的“舞台效应”，是不同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浓缩和集中反映。^② 土以这一“奇特组合”，引起学界所高度关注，关于该问题研究也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③ 学术界对土以关系主要有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观察视角，关注的问题则集中于探讨双边关系遭受挫折的原因、影响和土以关系的前景。

（一）学界的研究视角

1. 建构主义的视角

于杰尔·博兹达利奥卢（Yucel Bozdaglioglu）指出，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唯一与以色列长期保持良好双边关系的国家，可从历史、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出发来探究原因。就历史而言，从奥斯曼帝国建立

^① 国内关于土耳其外交的研究则日渐增多，《西亚非洲》杂志2011年第9期刊出专栏“土耳其对外政策与外交关系：变化与演进”，内容涉及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视角下的库尔德问题等多个题材，展现了当下土耳其问题研究的热度和热点问题。具体篇目包括：肖宪：《构建中国与土耳其新型战略合作关系》，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14~28页；谢立忱：《认同视角下的土耳其对外政策》，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29~40页；王泽胜：《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41~52页；张春：《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53~67页；郑东超：《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视角下的库尔德问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68~77页。

^② South East European Studies at Oxfor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ld alignments and new neighbourhood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30 April - 2 May 2011, SEESOX, 2011, p. 13.

^③ Amikam Nachmani, *Turkey: Facing a New Millenniu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2.

伊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土耳其都是犹太人的朋友。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土耳其又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同样,犹太人是土耳其人全天候的朋友,无背叛之虞。双方历史地形成的彼此良好的形象被移植到现代双边关系之中。就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而言,以色列建国后的西方认同,以及以色列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之间良好的关系,使得土耳其颇有同路人之感,对土以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土以关系对双方的影响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土耳其是以色列通往中东之门,以色列是土耳其通往西方之门。^① 于杰尔·博兹达利奥卢较多强调了双方形象的建构在土以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双方利益则由各自的认同来界定,这种双边关系不仅提升了土耳其的西方认同,而且也提升了以色列的中东身份。而任何一方认同的变化都将导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受土耳其-阿拉伯关系好转的影响,土以关系处于低潮和蛰伏期。^② 巴里·罗宾(Barry Rubin)认为,土以友好关系是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原因在于它们同是中东地区民主的、世俗的、西方的和非阿拉伯国家。^③

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也认为,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历史恩怨,两者一致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它们都对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抱有敌对态度。它们都是西方化国家,与欧盟的关系麻烦不断,但是与美国关系密切。从1996年开始,两国开展了广泛的公开军事合作,包括互通情报、联合军演和大规模武器贸易。在相当程度上,它们的军事需求和备战能力是互补的。在反对恐怖主义和希腊-土耳其争端问题上,它们走得更近。它们互相扶持,一起对华盛顿施加强大影响。在1998年土耳其威胁对叙利亚诉诸武力之时,这种伙伴关系几乎肯定发挥了作用,迫使叙利亚不得不对土耳其做出让步,减少了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支持,并驱逐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④ 历史上的友好、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共同的他者强化了双方的相互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讲,土以双边关系具有强烈的建构主义

① Yucel Bozdagli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41-158.

② Ibid.

③ Bulent Aras, "The Academic Perceptions of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ring 2002, Vol. 1, No. 1, p. 8.

④ [英国]巴里·布赞、[丹麦]奥利·维夫著;潘忠岐、孙霞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01页。

色彩。

反过来,学者也注意到双方以世俗主义和西方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世界观,由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执政和亲伊斯兰因素激增而出现裂痕。菲利普·罗宾斯(Philip Robins)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伊斯兰主义影响的上升可能伤害到土以关系。^①奥芙拉·本希奥(Ofra Bengio)也指出,土以联盟很可能会受到两个事件影响,其一为正发党在选举中压倒性的胜利;其二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以色列作为美国政策无可置疑的支持者而出现,土耳其却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反对者。这样,土以关系最好的结果是经历痛苦的调整期。^②由此看来,建构主义将土以关系的波折归咎于共同价值观遭到了侵蚀。

2. 现实主义的视角

现实主义理论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土以关系的提升方面有较强的说服力。有学者指出,土耳其在90年代由于面临多重安全挑战而需要以色列的支持,因此双边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其中包含了众多的复杂因素。第一,库尔德分裂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对土耳其国家安定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土耳其与叙利亚和伊朗关系恶化,而且叙利亚和伊朗又支持库尔德分裂主义。与之相反,土以友好则可以维护土耳其领土和国家完整,保护世俗主义。第二,土耳其渐增对阿拉伯人的失望情绪,尤其是阿拉伯人在事关土耳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塞浦路斯问题上表现出的冷漠。美国却强烈支持土耳其与以色列深化双边关系,这使得土耳其和以色列合作成为富有吸引力之选择。第三,1991年开启的阿以和平进程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土以关系进入黄金期。这一时期军方在外交决策中有很分量,他们认为自身总体生存环境不佳,强调与以色列结盟对抗中东邻国,并推崇使用武力。^③

纳苏赫·乌斯卢(Nasuh Uslu)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由于巴以关系的缓和以及土耳其军方的积极推动,土以关系得到改善,也加大了土耳其在美国战略天平中的权重。同时,土以友好关系潜藏着恶化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

① Philip Robins,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1, p. 86.

② Ofra Bengio, *The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hip - 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 New York: Palgrave, 2004, p. 171.

③ Meltem Müftüler - Baç & Yaprak Gürsoy, "Is There a Europeanization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 Addendum to the Literature on EU Candidates", *Turkish Studies*, Vol. 11, No. 3, 2010, pp. 405 - 427.

系的风险。土耳其如果希望在区域事物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其外交政策就应更具灵活性,在改善与以色列关系方面尤其要慎之又慎。以疏远阿拉伯人为代价来发展土以关系,将会使得土耳其外交政策严重受限。2001 年国际及区域局势的变化将土以关系引向新的十字路口。^①可见,纳苏赫·乌斯卢更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土耳其的以色列政策,剖析了土耳其中东外交的尴尬,尤其是双边关系中潜藏的危机。

莉诺·马丁(Lenore G. Martin)更多强调土耳其中东外交的两难境地,她谈及土耳其在中东奉行消极中立政策到积极的中东政策之转变,尤其是 1996 年以来土耳其和以色列双边关系提升的背景之下。莉诺·马丁同时指出,土以关系越密切,土耳其就越难处理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而土耳其主动为土以双边关系降温,势必会导致土耳其国内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关系再度紧张。^②

现实主义理论证明土耳其在中东难以避免零和游戏的尴尬局面,必须在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平衡和选择,而巴以和平进程的进展,土耳其国内文官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土耳其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在实力方面的限制等都制约着土耳其的抉择。

(二) 近期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

新世纪以来土以关系急转直下,使得学术界在近期更多地关注到土以关系遭受挫折的原因、影响和双边关系的前景。

1. 土以关系遭受挫折的原因及其影响

21 世纪初期国际社会评价土以关系的主调是“双边关系正在下沉”。关于缘由的分析,主流观点认为,土耳其主要是正发党以及埃尔多安,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有观点认为,土耳其抓住“加沙国际救援船队事件”不放,目的在于证明正发党领导下的土耳其已经成为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这一事件与在 2009 年达沃斯峰会上埃尔多安与土耳其总理佩雷斯的冲突相互呼应。^③这种观点实际是强调土以关系的表演性质,并指责土耳其应该为双边关

① Nasuh Us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 - Cold War Period*,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4, p. 98, pp. 102 - 105.

② Lenore G. Martin and Dimitris Keridis, eds, *The Futur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p. 181 - 186.

③ Anat Lapidot - Firilla, "Sinking Turkey - Israel Relations", *The Jerusalem Post*, June 1st, 2010.

系的倒退承担责任。持有类似观点的学者数目不小,埃夫拉伊姆·因巴尔(Efraim Inbar)就指出,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在土耳其一方,以色列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土耳其对以色列采取的敌视态度实际上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型的一个主要部分,土耳其正远离西方,这也表现在土耳其在哈马斯问题上与西方的分歧。

然而,现在尚难以判断土耳其在这样一个外交方向上会坚持多久。^①以色列驻土耳其外交官莱维(Levy)更是指责,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外交裂缝在于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仇恨,“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对我们充满宗教仇恨”。^②而美国前驻土耳其大使詹姆斯·杰弗里(James Jeffrey)颇有同感,“我们与土耳其政府官员和民众的接触和讨论似乎都在证实莱维的观点,即双边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埃尔多安讨厌以色列”。^③这一观点强调了国家主要政治领导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一国外交的走向。中国学者王泽胜也注意到土耳其实践与推行独立性和全面性的外交新思维的结果之一,就是强力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政策,而不一味迁就和支持以色列。^④

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以色列应该承担责任。尼姆罗德·戈伦指出,2011年6月正发党第三次赢得议会选举本可以成为土以改善关系的良机,然而由于以色列固执地拒绝道歉从而导致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⑤贝尔纳·乌尊指出正发党追求,通过改善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系从而提升土耳其和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并非刻意针对以色列。贝尔纳·乌尊同时认为这一外交转向对土耳其而言存在两个风险:其一是利益追求过于分散;其二,埃尔多安尖刻的评论可能引发民族主义和民粹正义情绪的上涨。诉诸历史,土耳其从来不是反犹的温床,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却有将其导向这一方

① Efraim Inbar, “Turkey says goodbye to Israel and the West”, *BESA Center Perspectives Papers*, No. 108, June 6, 2010.

② Barcin Yinanc, “WikiLeaks Releases to Complicate Israeli Ambassador’s Job in Turkey”, *Hurriyetdailynews*, November 30, 2010.

③ Umit Enginsoy, “Israel, US agree: Turkish gov’t ‘hates’ Israel”, *Hurriyetdailynews*, November 29, 2010.

④ 参见王泽胜:《土耳其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的新变化》,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50页。

⑤ See Nimrod Goren, “An Unfulfilled Opportunity for Reconciliation: Israel and Turkey during the Arab Spring”,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4, April 1, 2012, pp. 121 - 135.

向的可能性。^① 土耳其驻美大使纳米克·唐 (H. E. Namik Tan) 提及土以关系时指出,土以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双边合作关系 60 多年来从未间断。土耳其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现行政策冒着失去中东最好的朋友的风险,最终导致其全球孤立地位。土以关系的改善,关键看以色列,以色列应该改变其现有的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②

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的论述更为客观和全面。汪波从国家政治领导人意识形态倾向性与个性、国家内部社会潮流转变和政治局势发展、伊拉克战争后地区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库尔德问题发展的国际化与复杂化等三方面分析了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由此判定,这一恶化将导致该地区国家之间安全联盟的重组,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景以及地区跨国性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带来更多变数。^③ 李秉忠则从更长时段出发,认为国际背景转变、土耳其政坛力量变化,以及以色列外交缺陷凸显是两国关系恶化的主因。^④ 国际及区域格局变迁、土以双方外交的各自调整以及政治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在双边关系恶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应客观分析。

2. 土以关系的前景

学界对土以关系的前景,总体上持乐观态度,认为双边关系一方面较从前更趋复杂化,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向更深程度恶化。伊尔凯尔·艾蒂尔克认为土以关系难以逃脱以下两个深层因素的制约:第一,土以关系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态度紧紧捆绑在一起;第二,双边关系深度已经使得分离非常复杂和困难。^⑤ 有学者谈到达沃斯事件时认为,该事件表明土以和解对于区域和平意义重大,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双边关系。如所有双边关系一样,

① Berna Uzun,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in the shadow of AKP party", *Telaviv Notes*, December 24, 2009, p. 3.

② H. E. Namik Tan, "Turkish - U. S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CSIS*, July 22, 2010.

③ 参见汪波:《土耳其与以色列当前关系危机的原因分析》,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4期,第47~53页。

④ 参见李秉忠:《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2期,第28~32页。

⑤ Iker Aytürk, "Between Crisis and Cooperation: The Future of Turkish - Israel Relations",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2, 2009, pp. 57 - 74.

土以关系也有社会、政治和心理的维度。^① 奥芙拉·本希奥认为,土以双方仍有重大的利益关切使得双边必须维持紧密关系。^② 概而言之,一些深层次的规定使得土以关系不会走得太远。李秉忠谈及土以关系的前景时指出,土耳其实力有限、土以关系恶化机会成本增大,以及土耳其战略的西方取向,决定了两国关系仍有回暖空间。^③

当然也不乏持悲观态度者。厄梅尔·塔什珀纳尔认为,以色列与土耳其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已经达到不可修复的地步。在他看来,土耳其的要求不仅仅是道歉,而且要结束加沙的封锁状态,内塔尼亚胡政府据此认为土耳其的索价过高,这才是双边关系难以修复的真正原因。双边关系 90 年代的黄金时代归因于奥斯陆和平进程,今天在和平进程缺乏的情况下,双边关系就会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土以关系也就难以回复到 90 年代的黄金期。就此看来,90 年代所呈现的是双边关系的异态而非常态。^④ 巴里·拉宾则主要从土耳其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入手,认为土以关系至少在正发党任期内难以改变。^⑤ 尼姆罗德·戈伦则从以色列国内政治入手,认为土以关系有可能在以色列大选后方可能改善。^⑥ 中国学者高祖贵认为,土耳其出于顺应阿拉伯国家民众的反以情绪和提升地区影响力的需要,在有关以色列的一系列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以色列面临失去在中东地区唯一盟友的危险。土耳其和美国注重处理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加剧了以色列的孤立处境,以色列整个安全环境明显恶化。^⑦

概而言之,学界针对土以关系的诠释的分歧实质上是在讨论现实主义主导土以关系,还是建构主义占有更大份额。现实主义强调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在土以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所占分量较轻。建构主

① Gökhan Bacık,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after Davos: A View from Turkey",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2, 2009, pp. 31 - 41.

② Ofra Bengio, "Altering Interests and Orient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Turkey: A View from Israel", *Insight Turkey*, Vol. 11, No. 2, 2009, pp. 43 - 55.

③ 李秉忠:前引文。

④ Ömer Taspınar, "Deciphering Israel's Behavior", *Today's Zaman*, Sep. 5, 2011.

⑤ Barry Rubin,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in the Shadow of the Arab Spring, Meria, <http://www.gloria-center.org/2012/04/turkish-israeli-relations-in-the-shadow-of-the-arab-spring>, 2012-04-27.

⑥ Nimrod Goren, op. cit.

⑦ 参见高祖贵:《中东大变局对以色列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97~106页。

义则强调观念、理想、基本价值观、规范等要素在土以关系中压倒性的作用，他们认为土以关系蜜月期的主要动因是亲西方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势力的上升则是导致双方关系疏远的动因。事实上土以关系 60 多年的发展非常复杂，需要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

土以关系的历史演变

土以关系 60 年多年的发展一波三折，可以 1949 年、1967 年、1991 年、2008 年为界粗略地划分为 4 个阶段。

（一）1949 年土耳其承认以色列，土以关系开局良好

以色列 1948 年 5 月 14 日建国之后，虽然在国际上得到美国和苏联的支持，但是在中东却处于孤立隔绝的境地。土耳其主要出于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考虑，于 1949 年正式从外交上承认了以色列，奠定了双边关系的良好开局。以色列和土耳其双方在 50 年代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以色列无疑意义重大。这一时期的土以关系，为以色列 - 苏联关系的阴影所笼罩，多少有点“羞涩”。冷战的爆发和土、以同属西方阵营的现实，减少了苏联因素对土以关系的影响，美国因素转而激增，“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后的苏联政策当中，支持阿拉伯对抗以色列一直是其中的重要方针之一，这个方针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表现得更为强烈。……在这个关系之下，美国成为以色列最主要的外交、战略，以及接下来的财政方面的支持来源。”^① 苏联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逐渐降低，然而阿拉伯因素的影响却明显增大。1958 年伊拉克退出《巴格达条约》后，土耳其与以色列、伊朗、埃塞俄比亚签订了《秘密协定》，用以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然而，这并不能割断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消除土耳其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同情，阿拉伯因素由微而显地影响到土以关系的通畅发展。

（二）1967 年阿以战争爆发，双边关系出现龃龉

土耳其对以色列态度一直比较模糊和摇摆，60 年代开始逐渐从严格中立转向了亲阿拉伯的倾向性中立，标志性事件就是 1967 年为支持阿拉伯国家，

^① [英国] 伯纳德·刘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 20 世纪末》，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80 页。

不惜损害与美国关系。土耳其在 60 年代向阿拉伯国家伸出橄榄枝,并于 1969 年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土耳其对以色列矛盾的态度,在 1956、1967 以及 1973 年的 3 次中东战争中得到最为明显的体现,表明土耳其在平衡中已经有所倾斜,土以关系由此出现龃龉。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降至临时代办级别。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土耳其禁止美国进入英克尔克空军基地以支持以色列,战后又赞成联合国关于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换取和平之“242 号决议”。1973 年战争中土耳其像前两次一样采取了亲阿拉伯的立场,不允许美国使用英克尔克空军基地来支持以色列。1974 年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1975 年投票赞同联合国通过的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①另外,20 世纪 70 年代土耳其在石油和塞浦路斯问题上需要求助于阿拉伯国家,因而更大程度上削弱了土以关系,土以关系出现较大裂痕。1980 年 9 月 12 日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在西方陷入孤立,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则得到发展。1980 年 11 月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法案”,宣布耶路撒冷为永久首都,土以关系跌入低谷。1980 年 11 月 26 日,土耳其将双边关系降至二秘级,并于 1981 年 2 月起生效。

(三)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土以关系步入黄金期

海湾战争导致的阿拉伯世界分裂、战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友好态度、石油经济作用的一度式微,以及巴以和平进程的推进等,使得 90 年代初期土以双边关系发展处于黄金期。^②以 1991 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开始马德里和谈为契机,土耳其 12 月 19 日宣布将土耳其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代表同时提升到大使级别,土、以双方开始互派大使,并于 1992 年全面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双边关系进入一个较快发展期。1993 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的代表签署了《原则宣言》,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开始与以色列和谈,土以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土耳其于 1996 年与以色列开展了大规模的情报交流和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启动。^③在经贸、

① Ofra Bengio, *The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hip - 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 New York: Palgrave, 2004, p. 74.

② Ofra Bengio, op. cit., pp. 78 - 79.

③ Sevil Kucukkosum, “Turkey Slams Israel with Last Minute deal dead”, *Hurriyetdailynews*, September 2, 2011.

通商、军事等领域也相互结盟，土耳其可以借以色列之力应对当时险恶的周边环境。厄梅尔·塔什珀纳尔归纳了 20 世纪 90 年代双边关系改善的因素：繁荣党证明其权力的一种方式；土耳其与希腊步入战争边缘；土耳其与 2/3 的邻国存在问题。^① 土耳其与邻国麻烦越多，土以关系就越活跃，正是得益于以色列坚定的支持，土耳其对邻国推行强硬外交，因此获得“后冷战时代的勇士”之称号。以色列也非常推崇土耳其在中东的重要作用，拉宾遇刺后出任以色列总理的佩雷斯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发动机和区域性超级大国。^② 90 年代后期土耳其与邻国关系逐步改善，同时积极介入阿以和平进程，土以关系黄金期得以延续。

（四）2008 年以色列进攻加沙，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

土以关系的软肋还是巴勒斯坦问题，双方矛盾因 2000 年巴勒斯坦人的“阿克萨暴动”而公开化和激化。2002 年“阿克萨暴动”引发的以色列镇压，导致 1 500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指责沙龙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是“大屠杀”。另外，美以关系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微妙变化也值得关注。^③ 2004 年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暗杀“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是“恐怖主义”。时隔几个月，他再次指责以色列人在加沙的政策为“国家主导的恐怖主义”。^④ 总体而言，双边关系此时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2004 年土耳其提出向以色列输送淡水，以换取后者的武器。双边关系的急转直下发生于 2007 年正发党赢得第二任期和 2008 年以色列进攻加沙之后。《经济学家》刊文认为，2008 年以色列炮击加沙事件是土以关系的转折点。^⑤ 2009 年达沃斯峰会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发生争执，拂袖而去，为土以关系的戏剧性特点增添了新的色调。以加沙国际救援船队 2010 年 4 月遭遇以色列军队袭击事件为界标，2011 年 9 月土耳其要求以色列大使限期离境，将双边外交关系降至二秘级，土以关系降至谷底，双边关系的缓和至今仍未有突破性进展。以色列失去一个难得朋友的同时，土耳其也失去了一个坚定的盟友。

① South East European Studies at Oxfor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ld Alignments and New Neighbourhoods*, 2011.

② Amikam Nachmani, op. cit., p. 202.

③ South East European Studies at Oxfor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Old Alignments and New Neighbourhoods*, 2010.

④ Ann Dismorr, *Turkey Decoded*, London: SAQI, 2008, pp. 177 - 179.

⑤ “Is Turkey Turning? Turkey is Rethinking Its Place in the World”, *Economist*, June 10, 2010.

土以关系 60 多年来的波折表明,利益与身份认同感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可塑性,正是共同的“西方身份”认同将土、以绑在一起,并保证双边关系不至于走得太远。与此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共有观念有时会与国际及区域结构和具体国家利益发生冲撞,从而影响到土以关系。无论是 6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的不睦,还是 90 年代的蜜月期,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互作用的产物。新世纪以来,双方的共有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分化,土耳其争当区域领袖的政治抱负与以色列中东利益也产生了分野,导致双边关系呈下降趋势。因此,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可较为中肯地诠释土以关系的变化,这也是由土以关系的特点所决定。

土以关系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

土以关系在中东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都是一组特殊的双边关系,它具有 4 个特点:阿拉伯和美国因素对双边关系影响明显,双边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和非常态性,正发党重塑了土以关系,双方认同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 阿拉伯和美国因素的双重影响

· 由于土耳其与以色列特殊的地缘政治和迥异的文化背景,土、以组合一直被冠以“奇特姻缘”之称谓,这一奇特组合易受外来因素的作用,美国与阿拉伯是其中的两个恒定因素,集中表现为“土-以-阿拉伯”和“土-以-美国”^①这两组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凯末尔·居尔塞尔(Cemal Gürsel)将军一语道破以色列在中东的微妙处境,诠释了土以双边关系中的阿拉伯因素。1960 年 5 月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以色列希望借此提升与土耳其外交关系,凯末尔·居尔塞尔将军答复道:“土耳其与以色列发展双边关系,类似于我们爱上一个同时被许多男人追求的女人”。^②以色列的微妙处境成为双边关系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导致“以色列-土耳其-阿拉伯国家”³对关系两两排斥,土耳其处于居间位置,竭力扮演

^① See Ofra Bengi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sraeli - Turkish Relationship”, in Bruce Maddy - Weitzman and Asher Susser,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in a Trans - Atlantic Context”, The Moshe Dayan Center, Tel Aviv University, 2005, p. 51.

^② Ahmet Davutog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2008, pp. 77 - 96.

着平衡者的角色。然而,如同玩跷跷板一样,平衡并不是主要状态。纳克曼尼就此断言,土以关系是修复中东关系的桥梁,以色列在土以关系中颇有“情妇情结——委曲求全”之怨艾,土耳其也抱怨这种关系的“零和游戏”性质。^①这表明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共同受制于它们与中东其他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突出表现就是阿以关系与土以关系变迁的相关性。虽然土耳其认为自己与以色列的共同之处多于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之处,然而现实的考虑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②1997 年召开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八次首脑会议宣布成员国深切关注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要求土耳其立即停止。^③这就不难理解 80 年代土耳其为改善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而将土以双边关系降至二秘级;90 年代巴以冲突的缓和较大程度地改善了土以关系,因此土以关系达到黄金期;21 世纪阿以和平受挫一直制约着土以关系的发展。

“土-以-美国”这 3 对关系中大体上是两两相互强化,以色列处于居间位置,美国享有最后的发言权,证明了土以关系中美国因素举足轻重。这一组关系的核心在于土耳其对西方文明的认同与追求,建国之初,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就认定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的文明,成为西方文明国家的一员是土耳其既定的战略目标。与此相关的是,土耳其记忆中的阿拉伯人是在其背后捅刀的“背叛者”,以色列人则是全天候之朋友。这样土耳其、以色列将自己锚定在西方的战略选择、它们的地缘政治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从深层次上决定了土耳其-以色列关系、土耳其-美国关系,以及以色列-美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关系。冷战期间,土以双方都是美国在中东坚定的盟友,中间的坎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的良性走向。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往往可以借助于以色列的力量。梅尔泰姆·米夫蒂莱尔-巴克(Meltem Muftuler-Bac)指出,土以关系在 90 年代晚期的升温,也增加了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的砝码。^④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上一结构性因素产生了深刻影响,土耳其外交调整最为顾及的还是美国因素,因此土以关系受到土美关系和美以关系的深刻影响,这使得土以关系不至于走得太远。

① Amikam Nachmani, op. cit., pp. 201, 237-238.

② Jacob Abadi, “Israel and Turkey: From Covert to Overt Relations”, <http://www.setav.org/ups/dosya/28724.pdf>, 2012-06-27.

③ Mahmut Bail Aykan, “The Turkish-Syria Crisis of October 1998: A Turkish View”, *Middle East Policy*, Vol. VI, No. 4, June 1999, pp. 174-191.

④ Meltem Muftuler-Bac, “Turkey and Israel: An Evolving Partnership”, *ACPR Policy*, No. 47, 1998.

（二）非对称性和非常态性

土以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土耳其拥有双边关系决定权的较大份额。以色列独特的地缘政治和复杂的历史包袱，使得它在区域中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敌视，生存环境非常险恶。土耳其却在宗教和文化上与中东多数国家有着亲缘关系，对地区事务中处于孤立地位的以色列而言，土耳其无疑是其重要的战略资源，这就决定了土耳其对以色列关系的优势地位。1947年土耳其对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案投了否决票；1949年3月28日，土耳其官方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存在；50年代，土耳其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充当诚实的掮客；70年代，土耳其受能源危机之影响，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在阿以冲突中采取更加平衡的立场，拒绝与美国合作，疏远与以色列关系；80年代，将双边关系降至二秘级；21世纪初，土耳其再次将双边关系降至二秘级。这表明土以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等地位，几乎所有的改善和提升双边关系的动议都来自于以色列，决断权却常常取决于土耳其。这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外交上的建构性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持续博弈。土以关系的非对称性也表现在秘密外交渠道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性，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在90年代之前存在着两个对比鲜明的渠道：秘密战略渠道和公开的外交渠道。前者是亲密而密集；后者低调而不太引人注目。1990年的海湾危机使得这两渠道公开地合二为一，双方在政治和战略上公开接近和合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凸显了土耳其后冷战时代的战略重要性：土耳其重返中东国际舞台，积极介入中东事务）。^① 土耳其在双边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是以色列情妇怨艾的根源。

土耳其外交调整期往往是双边关系接受考验期，再次证明了土以关系的非对称性和非常态性，这里面有正面案例也有反面案例。正面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全面介入中东事务，土以关系则得以提速。阿米卡姆·纳赫曼尼指出，1991年海湾战争为土耳其中东政策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土耳其刻意回避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位置，坚持不懈地追求西方的接纳。以此为界标，土耳其开始谨慎地涉足中东事务。如果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尚为权宜之计，土耳其此次涉足中东具有持久性。^② 重返中东的土耳其四面楚歌，加上库尔德问题的激化，因而亟需以色列的支撑。有史以来，土耳其从

^① Ofra Bengio, *op. cit.*, pp. 23 - 24.

^② Amikam Nachmani, *op. cit.*, pp. 201, 237 - 238.

未像 90 年代一样需要以色列的友谊,因而迎来了双边关系黄金期。海湾战争为土耳其重返中东铺平了道路,双方作为美国坚定的盟友并肩作战,同时土耳其积极地开始介入中东事务。……土耳其前驻美大使指出:土耳其应积极参与到区域建设中来,而不该成为其他国家的建筑材料。^①从长远来看,中东复杂的外交局面,要求土耳其更加注意外交的平衡,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为土以关系埋下了隐患。21 世纪土以关系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也提供了土以关系的反面案例。

21 世纪的头十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在中东和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扮演角色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段,土耳其政治家意识到时代的变迁和涌动的机会,伍罗德·威尔逊中心土耳其语美国关系研究专家伊恩·莱塞指出,土耳其正在重新筹划外交图景和重新判断远近亲疏,致力于开展积极、多元的外交政策。^②土耳其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外交导向也由安全型转向对“软实力”的强调。第一,土耳其与叙利亚和伊朗关系转好,显著降低了以色列在南部支持的必要性。反过来,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库尔德斯坦自治政府与以色列之间有密切合作,这令土耳其政府深感不安。第二,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的蜕化。第三,土耳其国内文官与军方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和商业利益成为在土耳其区域事务中最主要追求。第四,2008 年 12 月~2009 年 1 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成为双方关系新时代的开端。土耳其对安全和威胁都有了新的理解,土以关系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从前。^③致力于扮演区域重要角色的土耳其与以色列渐行渐远,中东大变局加剧了这一趋势,而且中东大变局以来美国对土耳其的区域作用前所未有地倚重,这种作用以色列难以企及,使得土以关系非对称性将会持久。这也表明后冷战时代,外交领域的意识形态色彩显著降低,现实主义影响增大。

① Amikam Nachmani, op. cit., pp. 23-24.

② Ian O. Lesser, "Beyond suspicion, Rethinking US - Turkish Relation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www.gmfus.org/wp-content/blogs.dir/1/files_mf/galleries/ct_news_article_attachments/Lesser_Beyond_Suspicion.pdf, 2012-05-18.

③ Gonul Tol, "Turkey and Israel: What Lies Behind the Recent Volte Face", <http://www.mei.edu/Library/OnlineResources/Countries/Turkey/tabid/584/ctl/Detail/mid/2932/xmid/894/xmfid/36/Default.aspx>, 2012-05-13.

(三) 正发党及埃尔多安的重要作用

土以关系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表现出强烈的亲西方性,双边关系的微调则受制于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外交一直处于调整期,而大幅度调整则始于正发党2002年执政。土耳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土耳其在其中的位置和使命,进行了新的阐述和定位,最为根本的因素是土耳其从根本上突破了中东外围国家的既有定位,开始不遗余力地追求区域领袖国地位。这一外交定位深刻作用于土以关系,一定意义上也重塑了土以关系。

现任土耳其外长达乌特奥卢对国际格局做了有利于土耳其的划分,将土耳其置于国际事务的中心地位,以色列对土耳其的定位则显得茫然,因而影响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达乌特奥卢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两极格局是以一方的突然坍塌而结束,不像之前冲突或战争那样带来了全球和平或新的预防冲突的国际体系,导致的结果就是从1989~2001年,许多曾经冻结的危机发展为全球性的冲突。土耳其处于多种文明的交叉处,自己在民族构成上的多族裔性使得土耳其在形成新的全球秩序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土耳其可以为建立一个全球新秩序以便解决或者抑制冲突奠定基础。^①达乌特奥卢针对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将土耳其定义为被撕裂的国家的说法,针锋相对地指出“土耳其不是一个被撕裂的国家,土耳其生存的世界却被撕成碎片,土耳其是一个试图将这些碎片缀合起来的国家。……土耳其传统外交角色就像是救火员,新纪元中预防火灾的发生成为土耳其外交的主调。”“土耳其现在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充满活力的世界应该赋予我们的外交以新的动力。”^②达乌特奥卢进一步指出,土耳其外交的远景规划建立在3种方法和5条操作原则基础之上。3种方法指以前瞻性外交模式取代危机导向模式;强调一致性和连贯性;注重新的话语和新的外交模式,主要是传播土耳其的软实力。5种操作原则指的安全和民主的平衡;“零问题”周边睦邻外交政策;积极主动以及在和平问题上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多维度的外交政策;有节奏的外交政策。^③

① Ahmet Davutoglu, op. cit., pp. 77-96.

② Fulyaozerkan, “FM Hails Turkish Role in 21st Century as ‘Wise Country’”, *Hurriyetdailynews*, Jan. 3, 2011.

③ Ahmet Davutog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Outlook: An Assessment of the Present and a Look into the Future”;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2008, pp. 77-96.

土耳其有所作为外交的首选是区域和平以及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而阿、以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土以关系必然受挫,更大程度上受到这一政策调整的负面影响。

土耳其国内伊斯兰主义色彩的增加、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因素的减少,也使得土以睦邻关系的基础遭到削弱。《土耳其日报》资深编辑穆斯塔法·阿克约尔认为正发党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政党,埃尔多安本人同样是一个备受争议,同时又具有卡里斯玛魅力的人物。正发党是传统保守的伊斯兰价值和现代自由价值的综合。^① 奥芙拉·本希奥指出,埃尔多安似乎受一种类似于弥赛亚式的方法所指引,这有点类似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纳赛尔。在埃尔多安政府领导下土耳其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以牺牲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为代价,土耳其似乎获利丰厚,尤其是对埃尔多安而言,这样的举动使得埃尔多安以伊斯兰和巴勒斯坦的英雄自居。^② 无论是对 2008~2009 年的加沙战争的激烈言辞和达沃斯峰会的愤然离席,还是对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遇袭事件的强硬态度,抑或阿拉伯之春中的英雄形象,埃尔多安的这些言行都有统一的逻辑,那就是拿以色列开刀,争当区域领袖,服务于土耳其的全球抱负。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土耳其希望利用中东动荡的局势来兜售其独特的“软实力”,伊斯兰与民主的结合是这一软权力的最大卖点,以色列因此成为祭品,双边关系恶化一定程度上是埃尔多安 2002 年执政以来累计效应的体现。

(四) 认同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后冷战时代,社会因素对外交的作用更趋凸显。^③ 民调显示,土耳其民众对以色列并不持有友好态度,趋向于认为以色列是土耳其安全的主要威胁,对土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土耳其著名智库“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TESEV) 2010 年 12 月进行的民调问题之一为:哪个国家对土耳其最不友好?而以色列以 40% 的高票当选为对土耳其最不友好的国家。^④ 设在安卡拉的土

① Mustafa Akyol, Unveiling Erdogan's Real Face, *Hurriyetdailynews*, March 19, 2010.

② Ofra Bengio, "Turkey's Strategic U-Turn, Israel's Tactical Mistakes", *Telaviv Notes*, June 8, 2010.

③ Gokhan Bacik, "The Limits of an Alliance: Turkish-Israel Relations Revisited",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23, No. 3, 2001.

④ Mensur Akgun, Sabiha Senyucel Gundogar, and etc, "Foreign Policy Perceptions in Turkey", *TESEV Policy Programme*, TESEV Publications, May 2011.

土耳其战略和社会研究中心（MetroPoll）2011年在土耳其民众中就土以关系的调查结果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冻结土以关系，27.9%认为应该改善与以色列这个昔日盟友之间的关系。关于对土耳其最大的威胁进行调查，结果为：42.6%的受访者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美国；23.7%认为是以色列；伊朗为3%；希腊为2.3%；伊拉克为2.1%；俄罗斯为1.7%。此次民调错误率为2.5%，可信度为95%。^①事隔一年，该中心2012年6月就2010年以色列袭击国际救援船队的原因进行调查，结果是45.3%的民众认为以色列出于损害埃尔多安国内和国际声誉的需要，33.2%的民众认为以色列为了保障加沙封锁不被破坏，其余答案为“不清楚”。^②上述调查表明，至少就土耳其而言，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社会和心理维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民族主义情绪持续上升。以色列方面则主要表现为前往土耳其旅游人数剧减。利好的因素是以色列人总体而言对土耳其人并无太多恶意，而且双边贸易并没有因为外交关系降级而受到影响，2012年前3个月土以双边贸易额与2010年同期相比超过23%。^③

中东大变局使得这块是非之地矛盾更为错综复杂。伊斯兰主义力量影响明显上升；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国际社会在叙利亚的分歧助长了这一趋势；伊朗核问题依然是悬在地区上空的“达摩克利特”之剑；巴以和谈困境重重；库尔德问题有趋于恶化的倾向，这些矛盾对土以关系的影响深刻而持久。而且中东剧变发生以来，土耳其对“阿拉伯之春”积极支持，力争在区域局势重塑中有所作为；以色列则显得非常被动，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不同的立场刺激了双方认同的变迁。区域局势的走向，土以经贸往来与民众之间的交往和认同变迁恐怕是双边关系走向的更深层规定。

土以关系的发展趋势

土以关系的非对称性使得双边关系极其脆弱，极易受到国际格局、区域

① Betül Akkaya Demірbaş “Poll: New CHP Unable to Come to Power, Solve Kurdish Question”, *Today-szaman*, May 1, 2011.

② MetroPoll, “Political Attitude Survey – June 2012”, <http://www.metropoll.com.tr>, 2012-07-15.

③ Soner Cagaptay and Tyler Evans, “The Unexpected Vitality of Turkish – Israeli Trade”, *Research Notes of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16, June 2012.

环境,尤其是与邻国关系的影响。任何一对双边外交得以顺畅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双方应该对双边关系拥有几乎同等的否决权,这显然是土以关系所不具备的条件,土耳其压倒性地拥有双边关系的决定权,以色列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被动性特点。纵观双边关系史,只有当土耳其因地区形势严峻有求于以色列、通往西方的大门出现障碍或巴以和平进程取得重大突破之时,双边关系的不平衡性在短期内方可得到校正,也是土以关系最为良性发展时期。因此,双边关系从根本上摆脱非常态性则有赖于地区格局的深刻变革,以此为基础改善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而中东大变局中土耳其以赢家身份出现,以色列则前所未有地被孤立,导致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加剧了。国内民意和舆论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的权重也会日渐增加,土以关系未来发展难以一帆风顺。

另一方面,中东局势持续恶化,危机时刻现实主义外交往往更具重要性。在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尤其是土耳其战机被叙利亚击落事件发生后,土耳其需要与以色列修补关系,从而更从容地应对叙利亚危机。卡内基国际和平组织土耳其专家亨利·巴克尔(Henry Barkey)认为土耳其希望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问题是对自己的重要性估计过高。^①而叙利亚局势持续恶化的负面效应也已经外溢至以色列,土耳其在中东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背景下,更需要以色列的友谊。完全失去以色列友谊的土耳其,在中东就失去了一个战略支撑点和一个比较优势。以色列则开始承认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特点,新任以色列副总理沙乌勒·莫法兹于2012年6月20日强调,修复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事关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战略目标,以色列要适应土耳其在中东的超级大国地位。^②事实上,早在2007年时,以色列情报和防务机构专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的阿拉伯大国埃及和约旦影响正在减弱,而土耳其和伊朗正上升为区域性大国。^③另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象征性地做出姿态,巴以将有望在近期重启2010年以来停滞的中东和平进程。^④而且,继外长利伯曼表态愿意与以色列修复关系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强调区域局势已经

① Mary Beth Sheridan, "Turkey's Foreign Policy Moves Raise Concern in West at Home," *Washington-post*, June 6, 2010.

② "Turkey is a Superpower: Israeli Deputy PM", *Hurriyetdailynews*, June 20, 2012.

③ Israeli intelligence analysts: Turkey Rising as Regional Superpower, *Hurriyetdailynews*, Jan. 27, 20017.

④ "Israeli Deputy PM has been Tasked to Revive Mideast Talks", *Hurriyetdailynews*, June 29, 2012.

发生深刻变化，土以修复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① 这些积极信号表明，土以关系短期内改善的基本条件正在齐备，叙利亚局势的走向将成为土以关系的关节点。

On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Li Bingzhong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and there're four main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Arab countries' and Americ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the asymmetry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reshaping by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of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profoundly changing bases of identity of both sides. Due to the escalation of Syria situation and its spillover effect to Turkey and Israel, and Israel's new stance on Palestine issue, the relationship has acquired new dynamic for renewing and improving in the short run. However, in the long run, the relationship will undergo turbulence since the complex regional situation,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s of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largely unchanged characteristics of asymmetry in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Turkish – Israeli Relations; Constructivism; Realism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Servet Yanatma, "Netanyahu: We Want to Restore relations with Turkey", *Today's Zaman*, July 24th, 2012.